导　言

粮食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而 1950 年代以来，中共的粮食政策是和接管政权、对城乡传统生产关系进行改造的政治方针联系在一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四十多年粮食政策的历史，基本上是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从制定到贯彻实施、发展演变的历史。这一政策是中央政府在粮食分配和流通领域采取的一项影响深远的重大战略决策，后来发展成为包括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等农产品在内的一整套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体系。它既是一项曾经长期执行的经济政策，也是一项具有社会基本制度意义的政策。统购统销的实行被称为继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之后新中国财经战线上的第二次大战役(加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统称为财经战线的“三大战役”)①，其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粮食流通领域和农业领域。选取 1953～1957 年这段时间，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初期的实施情况进行考察，当是一项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一、探讨的对象

“统购统销”是本项研究涉及的一个主要概念，它原本是针对粮食购销问题提出的，指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计划收购”最初指代粮食的“征购”；“计划供应”最初指代粮食的“配给”(也称配售②)。关于这一点，陈云有如下比较详细的说明：“‘征购’，这个名称是骇人的，究竟叫什么可以考虑，但性质是这么一个性质”③；“‘配给’这个名词有点不太好听，一说起它就想到日伪统治时代的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况。现在改了一个名字,叫做‘计划供应’,是粮食部长章乃器先生想出来的”④“;总起来说,我们要在农村中采取征购粮食的办法,在城镇中采取配售粮食的办法,名称可以叫做‘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⑤。后来统购统销的种类扩大到油料、棉花、棉布等,因此可以说‘统购统销’是主要农产品的一种购销方式。由于统购统销最初是针对粮食供求失衡而出台的,并且在粮食问题上表现得也更为典型,因此,本项研究将讨论对象主要限定在粮食的统购统销上。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从 1953 年出台,到 1955 年三定制度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制度的制定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到 1957 年前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基本确立下来,其内容包括统购制度、统销制度、粮食市场管理制度、票证制度等。在此后 20 余年的时间里,各项制度的具体内容虽然有一些变动和调整,但基本原则没有什么更改。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也开始一步步的改革,以至最后被取消。但是每一具体制度取消的时间先后不一 粮食市场管理从 1979 年 4 月开始放宽,1983 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放宽了农村经济政策,粮食交易开始打破多年来由国家粮食部门独家经营、限定区域、品种等框架,实行多渠道、跨界经营,且经营品种也不受限制;统购制度是在 1985 年初被合同定购制度所取代;大多数地方的市镇定量供应制度是在 1993 年前后被取消(各地取消的时间先后不一),票证制度的主体部分(粮食供应证制度、粮票制度)也随之被取消(但是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一些地方又有反复);而票证制度中的粮食供应转移制度更是到 2001 年 5 月 1 日才被最终取消。

笔者之所以选择 1953～1957 年的河南省唐河县为中心,对国家(中央)、省、县三级政府与粮食统购统销的制度安排以及这一制度在乡村社会引起的变动进行考察,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将研究时段确定为 1953～1957 年期间,是由于这段时间是粮食统购统销从政策层面到具体贯彻实施、逐步制度化的关键时期,整个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是在 1957 年前后开始稳定下来的。另外,这

段时间也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几年：一方面中国当时处于“一五”计划的实施、完成时期，另一方面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三大改造”以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通过对1953～1957年期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基层贯彻实施的考察，有助于加深对这段时间的共和国社会转型的了解。此外，为了弄清事情的原委，在论述过程中研究的时段也有适当的前后延伸。

——将研究范围圈定在河南省唐河县，是基于以下的考虑：本项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基层，尤其是在乡村地区的具体运作，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变动，而唐河（属河南省南阳市）是一个农业大县，素有“南阳粮仓、油罐”之誉，该县还是全国首批商品粮基地县之一[⑥]。这样一个区域范围是研究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在基层运作的比较适宜的单位。另外，论及唐河县的粮食问题，必然要涉及河南省级地方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加之，在1952～1953年的粮价波动及粮食危机中，河南省的粮价波动曾引起中央决策层的极大关注。无论是河南全省范围的粮价波动，还是唐河县的粮食波动，都有相当的代表性。另外，据现有的资料来看，河南省是1952～1953年的粮食危机中最早出现粮价波动的省份，也是实行统购统销后最早发行地方粮票和在农村实行“以人定量”办法的省份。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在河南的运作具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加之，学界以往的乡村区域史研究多注目于华北、江南、珠江三角洲等地，对中原地区的研究明显关注不够，因此通过对唐河县这样一个个案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和加深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和了解。

——统购统销既是一个涉及农产品购销问题的经济政策，又是一个影响全局的根本政策。按照毛泽东的说法：“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⑦]。另外，有论者指出统购统销的作用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商业和流通领域的制度变化，实际上它是政府第一次采取行政手段来控制过去主要由市场机制调节的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农村，并通过农业合作化巩固了国家对农民的控制，不仅从根本上挖掉了商品经济和市场发育的基础，也极大地限制了农村

非农产业的发展'⑧。还有研究者认为'统购统销制度'是中国计划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的重要支柱'⑨。很显然，统购统销的实施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是从总体上看，国内外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尤其是对统购统销制度的研究不太深入，多是从宏观上立论，缺乏微观的分析，显得有些空泛。因此，通过对1953～1957年期间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在河南的形成过程及其在唐河县具体运作的探讨，一则可以推进对统购统销制度的深入研究，二则能够促进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乃至整个共和国史的研究。另外，通过本项研究，还有助于理清计划经济体制在农业领域确立的过程，进而可以深化对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研究，最终希望能为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历史启示。因此，从事本项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学术史回顾

由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对社会生活各方面产生的重大影响，所以它很早就受到关注，截至目前国内已有不少研究成果。

—— 关于1953年夏秋的粮食危机。薄一波对1953年夏秋出现的严峻粮食购销形势做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将粮食购销方面出现的紧张局势主要归因于城乡粮食供应面迅速扩大引起销量的大幅度增加和农民粮食消费量的提高两方面。另外，私营粮商同国家争夺粮源，也加剧了粮食购销方面的紧张局势⑩。庐陵的研究着重分析了1953年粮食危机和工业化战略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统购统销政策的关联，揭示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加速工业化的力量对粮食需求的刺激作用，并提出这次粮食危机的出现实际上是由于小农经济和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引起的⑪。金观涛、刘青峰对这次粮食危机发生的原因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认为主要是由土地改革引起的农业结构变化以至破坏商品粮供给机制而导致的⑫。

—— 关于实行统购统销的动因。薄一波将其归结为当时粮食供求矛盾发展的产物[13]。徐建青通过观察粮食和花纱布两类商品市价与牌价并行的运行机制,认为"建国之初,国家对市场机制的运用,保证了这个时期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增长,应该说是有成效的。但是,市价与牌价并行这种价格运行机制本身就是一种高成本的机制,而这个时期各利益群体的存在及其市场行为与国家计划目标之间的矛盾,更增加了国家在市场管理与市场交易中的成本。这也是主要农产品迅速走向计划购销的原因之一,或许这是更为直接的原因。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低于预期收益,或许可以部分解释建国前期国家的选择(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和市场变迁(市场渐趋萎缩,直至主要商品市场被大部分关闭)问题。而1953年的粮食统购统销,尽管有生产发展赶不上需求的问题,但市场控制的高成本或许是更直接的原因[14]。此外,台湾学者李福钟也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动机进行了剖析,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早在1953年粮食危机出现之前,就已是中共高层(很可能由毛亲自策划)不断在思索尝试的一项粮食政策",并进而提出"统购统销目的在保证粮食出口"[15]。

—— 关于统购统销与工业化的关系问题。其中,在关于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实现农业积累向工业领域转移的这样一种工业化建设资金的积累模式是不是受到苏联影响的问题上,目前还存在颇多争议。侯利敏的研究注意到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出台的影响,她认为中国的工业化资金积累方式是受到了前苏联的影响[16]。崔晓黎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出台时的政治、经济背景、决策者的思路、"一五"期间工业化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来自农业的积累在工业化资金积累中所占的比重、统购统销的价格变动和市场粮价变动的交互关系、农业税收情况等方面,探讨了统购统销与工业积累的问题,提出如下观点:(1)统购统销政策不同于前苏联的义务交售制。中国的统购统销实现积累的过程是在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一个不自觉的过程,不存在所谓1953年面临是否牺牲农业以获得工业积累的决策意图。(2)统购统销没有实现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工业积累超额资金的目的，至多农业为工业的资金积累量与正常的农业税率持平[17]。宋国青将统购统销主要理解为一种福利方式和积累机制，他认为福利和积累的矛盾是中国工业化初期的基本矛盾，在工业垄断不能达到资金积累的目的、重征土地税的时机又不成熟的情况下，剩下的选择就只有农产品低价统购统销这样一种福利方式和积累机制了——作为福利，低价统销农产品保证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温饱；作为积累，低价统购农产品降低了工业的平均成本，提高了工业的利润水平。他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统购统销是比较适合国情的发展方式[18]。

——对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决策过程，在薄一波所著《统购统销的实行》和赵发生主编的《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有较为详尽的叙述。通过以上这些论著，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决策过程已基本厘清。

——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在中央层面的制度变迁。薄一波在《统购统销的实行》中对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基本内容、发展演变有较为系统的论述[19]。他的一些观点被学界广泛引用，影响比较大。《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对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在"一五"时期的发展演变做了详尽考察[20]。由陈吉元、陈家骥、杨勋主编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也涉及统购统销制度的发展演变[21]。其他如陈廷煊的《建国以来粮食流通体制的演变》(《改革》1996年第6期)、郑有贵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演变及其绩效分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戴大新的《建国初期粮棉油统购统销政策评析》(《湖南师大学报》2001年第2期)，以及各种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著作的相关章节等，也都涉及粮食统购统销的制度变迁问题。汤兆培、赵晓斌则对粮食配给制度（侧重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历程做了系统考察[22]。通过以上这些论著，粮食统购统销在国家制度建构层面的演变脉络已基本厘清。另外，对于作为粮食统购统销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票证制度，目前已出现了专题性研究论文。张学兵的研究对票证[23]制度的渊源、票证制度的确

立过程做了论述[26]。田锡全的研究对粮食票证制度创设的缘起、在河南的确立过程及其作用进行了系统考察[25]。

——关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各地的实施情况。代表性的成果有朱丹的《统购统销政策在湖北的实施及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唐文起的《简论陈云粮食统购统销思想——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江苏贯彻实行谈起》(《学海》1995年第6期)、《粮食统购统销时期的救灾工作——〈四川省志·粮食志〉选登》(《粮食问题研究》1996年第1期)、曾伟的《粮食统购统销在广东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商业经济文荟》1996年第5期)等。这些论文已开始注意对统购统销在湖北、江苏、四川、广东等省级范围内贯彻实施及影响的研究，尤其是前两篇论文还运用了省一级的档案资料。在关于1950年代前半期国家对大都市基层社会统合的研究中，张济顺揭示了居民委员会在有关计划供应的政治动员和实施系统中所扮演的国家和社会的双重角色[28]。另外，统购统销与民众“日常生活”的话题也开始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雷颐的《‘日常生活’与历史研究》一文谈及统购统销与农民身份制、票证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等问题，并以此来说明“日常生活”史研究的重要性[27]。各省(市)、地、县粮食部门所编写的众多地方粮食志，都从行业史的角度辟出章节对统购统销在当地的贯彻实施做了粗线条的勾勒。比如，白福禄主编的《唐河县粮食志》，涉及粮食统购、粮食的供应与销售、国家粮食市场、票证等统购统销制度的具体问题[29]，但极为简略，多以大事记的形式点到为止。尽管如此，这些地方粮食志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不少资料和重要线索。

——关于统购统销的社会经济后果及影响。薄一波在《统购统销的实行》一文中，对统购统销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24]。《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对‘一五’期间粮食统购统销的实施成果进行了总结。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一是国家掌握了粮源，缓和了粮食的产需矛盾；二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保证社会各方面正常的粮食需要；三是粮食价格保持基本稳定；四是促进资本主义粮食商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30]。金观涛、刘青峰在《开放中的变迁 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中,在对统购统销与中国城乡隔离、农业合作化运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等的关系的分析上，均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此外,汤兆培、赵晓斌沿着粮食配给制度(侧重于城镇的粮食统销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历程,从配给的数量、品种、价格等方面，探讨它在社会各阶层间分配的平等性，在贯彻实施过程中的社会经济效益，以及这一制度所引发的后果等问题[31]。对于统购统销在保障国家粮食供给、稳定物价、支持工业化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此前的不少论著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对于统购统销在农业发展、固化城乡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以及它所连带出的购销价格‘倒挂’等方面的消极影响,不少著作也有所论及,但还需要做更多的量化和实证的研究和分析。

——相比较而言,国外(主要侧重于英文世界)对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研究起步比国内早一些。德怀特·珀金斯在分析统购统销实行的动因时，比较早地注意到建国初期强调发展重工业对粮食市场产生的压力。另外,他还从强调重工业、农业缺乏投资、意识形态、政治控制等方面,分析了对粮食、棉布、食用油等消费品实行定量供应的必要性[32]。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涉及粮食统购统销问题，对于 1953 年秋出现粮食危机时，中国中央政府没有依靠价格调节机制而是采取统购统销的原因，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解释[33]。托马斯·P. 伯恩斯坦的《1955 年春粮食供应危机中处于无保障和被剥夺状态下的干部与农民行为》,对 1955 年春的粮食危机进行了深入探讨。他在文中剖析了粮食危机发生的原因，突出了基层干部在整个政治体制运作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以及他们作为高层权威和群众之间的联系纽带所面对的种种困难，揭示了中国乡村开展的群众运动的运作机制[34]。

——对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在基层的实际运作情况，国外学者提供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维维恩·舒在关于 1949～1956 年中国农村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动力的探讨中，涉及到粮食统购统销问

题。她主要运用省一级的报刊资料，考察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湖北、湖南两省的实施情况，以及这一政策在农村引起的变动[35]。肯尼斯·R. 沃克用了十年多时间写就了《中国粮食的收购与消费》一书。他在书中追溯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 1953～1962 年期间和 1970 年代后期的发展历程，主要关注于对各省内部、省与省之间、城乡之间粮食统购与统销数字的评估，并试图估量统销制度对粮食消费造成的影响[36]。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就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具体问题进行系统探讨的著作。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对粮食统购统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定"政策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实施及其所引起的变动做了研究，对其在农村集体化和农村经济被纳入计划经济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做了评析[37]。简·奥伊在《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农民：乡村政府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运用丰富的报刊资料和访谈资料，比较细致地探讨了中国农村在集体化时期（1955～1984 年），尤其是人民公社化时期的粮食征购过程以及其中所体现的各种权力关系。她在书中运用社会学的"庇护主义"理论模式，研究了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影响国家的政策目标（主要体现在国家对"农业剩余"的控制上）和执行结果的，关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方式[38]。该书在方法论上多有值得借鉴之处。

从以上对研究现状的介绍可以看出，学术界对统购统销的研究多停留在宏观决策、制度变迁的层面上，而对其实际运作则缺乏较为系统的实证性研究。即使涉及统购统销的决策过程，其中尚有不少环节的研究仍是比较薄弱的。比如，有关 1953 年和 1955 年两次粮食危机的图景是相当模糊的，它们与统购统销政策有着什么关联？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与统购统销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统购统销是如何被纳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统购统销政策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哪里？此外，关于统购统销的"制度变迁"，过去多侧重"国家（中央）"这一层面，对于"省"、"县"这些层面则鲜有触及。"国家"出台统购统销政策后，为了把它贯彻执行下去，在"省"、"县"两级做了哪些具体的制度安排？统购统销实行的过程

中，碰到哪些问题，带来哪些问题，当时各阶层民众对它的反应如何？统购统销在其实施的过程中，对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哪些具体的变动和影响？等等，这些问题的研究也甚为薄弱，均须结合个案进行深入探讨并做出客观评析。有鉴于此，笔者利用丰富的档案资料和各种报刊资料，从国家、省、县三个层面入手，以粮食统购统销的制度化过程及其在基层的实际运作为研究对象，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 1953～1957 年期间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考察。具体包括：对影响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决策的各种因素的分析、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形成过程及其在基层的实际运作、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给民众日常生活带来的变动等。

三、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笔者研究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唐河县档案馆所藏的有关 1953～1957年期间中共唐河县委、唐河县政府、唐河县粮食局、唐河县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共唐河县委宣传部等部门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档案。笔者在唐河县档案馆还找到了《唐河报》、《南阳报》、《河南日报》等地方性报纸和国家粮食部主办的《粮食工作》等期刊。另外，笔者还在南阳市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搜集了 1953～1957年期间南阳专员行署粮食局、中共南阳地委、南阳专员行署、河南省粮食厅、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政府、国家粮食部等部门的有关档案资料。除以上材料外，还利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所编写的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各类地方志书以及当时有关部门出版的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法令汇编、宣传材料、统计资料汇集表册等。对于影响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决策的各种因素的研究，主要依据的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多卷本《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商业部当代中国粮食工作编辑部编辑的《当代中国粮食工作史料》（下卷），主要领导人年谱、当事人的文集文稿等。同时，还吸收了现有的研究成果。

要理解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其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变动，就需要考察更大范围的历史变迁——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及其制度化的过程。在了解了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知识的情况下，便会对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变动有更为深刻的体会。另外，如鲍大可所说的"要理解中国政治活动的真实情况，单单观察中央领导阶层所宣传的政策是不够的，而必须确知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大众的态度和基层干部的行为都会影响到最后的结果——是怎样演变、修改或者变得适用"[39]。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主要是运用了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既注重于对影响统购统销政策决策的各种因素的分析，对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形成过程做了细致的梳理，也着力从微观分析入手——在充分占有档案资料和进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基础上，对统购统销政策在基层的实际运作与基层民众的反应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具体而微的分析。笔者在研究中力图将区域研究放入更为广阔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以通过特殊个案加深对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乃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认识和理解。

注释：

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②从陈云1953年10月13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的发言可以看到，他当时是将"配给"和"配售"混用的。参见商业部当代中国粮食工作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粮食工作史料》上卷（内部发行），1989年版，第171页。

③陈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3年10月10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1页。

④同③，第458页。

⑤同③，第461页。

⑥白福禄主编：《唐河县粮食志》（内部发行），1988年版，第1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5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⑧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51～252页。

⑨转引自张曙光主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 1 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70页。

⑩同①,第 255～283 页。

⑪庐陵:《1953年中国的粮食危机与统购统销政策的起源》,《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3 年第 4期,第 41～42页。

⑫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 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第 418～419、420～421页。

⑬同①,第 255 页。

⑭徐建青:《建国前期的市价与牌价——从价格机制到统购统销》,《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 2期,第 45～58 页。

⑮李福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0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3年 6月出版,第 198～217 页。

⑯侯利敏:《对中国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评价》,《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2期,第 32～33 页。

⑰崔晓黎:《统购统销与工业积累》,《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8 年第 4期,第 120～135页。

⑱宋国青:《从统购统销到土地税》,载周其仁编:《农村变革与中国发展:1978～1989(“下”)》,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第 362～413页。这篇文章作于 1982 年底,曾以《从统购统销到议价交换》为题,作为《经济结构与经济改革》的第三部分内部印发。

⑲同①,第 267～279 页。

⑳赵发生主编:《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5～96 页。

㉑陈吉元、陈家骥、杨勋主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77～185 页。

㉒汤兆培、赵晓斌:《中国粮食配给制度的沿革及其平等与效益》,香港浸会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 4～11页。

㉓该文中的“票证”,指中国计划经济年代里主要用来购买日用消费品的无价凭证,包括票、证、券三种类别,不只限于粮食票证。

㉔张学兵:《新中国票证制度的确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增刊,第 68～75 页。

㉕田锡全:《统购统销初期的粮食票证制度探析——以 1953～1957 年的河南为个案》,《史学月刊》 2004 年第 5期,第 72～77 页。

㉖ 张济顺：《上海里弄 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1955)》，《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 2期，第 185～188 页。

㉗ 雷颐：《"日常生活"与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0 年第 3期，第 121～123 页。

㉘ 《唐河县粮食志》，第 63～116 页。

㉙ 同①，第 279～283 页。

㉚ 同⑳，第 96～103 页。

㉛ 同㉒。

㉜ Dwight H. Perkins, *Market Control and Planning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and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42、pp. 205～214.

㉝ [美]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69～185 页。

㉞ Thomas P. Bernstein, "Cadre and peasant behavior under conditions of insecurity and deprivation: The grain supply crisis of the spring of 1955", A. Doak Barnett, ed.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0, pp. 365～399.

㉟ Vivienne Shue, *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 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Toward Socialism, 1949～195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p. 214～245

㊱ Kenneth. R. Walker, *Food Grain Procurement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㊲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 2000年版，第 173～175 页。

㊳ Jean C. Oi,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and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该书的第一章主要讨论了方法论问题，已由孙立平译出，以《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农民》为标题发表在《国外社会学》1996 年第 5～6期，第 63～67 页。该书的第二、三章对"收成的分割"和粮食征购过程介绍尤详。

㊴ A. Doak Barnett, ed.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0, p. xx.

第1章

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缘起

1950 年代初期，刚刚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粮食问题时，侧重于将其纳入社会控制与社会保障的视野下进行考量。基于此，粮食问题就决不单单被视作经济问题了。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也正是由中央政府在粮食分配和流通领域采取的一项涉及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本章从 1953 年和 1955 年的两次粮食危机、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过渡时期总路线、国内外相关粮食购销制度方面及其与统购统销政策的关系，来考察和分析影响统购统销政策决策的各种因素。

一、两次粮食危机及其对策

在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酝酿出台和发展演变的过程中，1953 年秋和 1955 年春的两次粮食危机是比较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以下对这两次粮食危机发生的原委以及中央政府有关决策者处理粮食危机的对策进行研究，从而揭示出两次粮食危机与统购统销政策之间的关联。

（一）1952～1953 年的粮价波动和粮食危机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

在以往有关粮食统购统销的研究中，谈及 1953 年秋的粮食危机，一般观点均认为由于私营粮商同国家争夺粮源，在 1953 年春的兴风作浪、哄抬物价，影响了国家对粮食的控制，再加上工业化对粮

食需求的增加、农民自身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从而导致了国家粮食购销失衡，因此产生了实行统购统销的必要。其中，似乎是私营粮商同国家争夺粮源对粮食购销失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总体上看，以往关于1952年下半年～1953年秋期间中国粮食形势的图景是相当模糊的。因此，有必要对导致1952年后半年和1953年春粮价波动、1953年秋粮食危机的缘由以及粮食危机与统购统销政策出台的关系进行追溯和探讨。

1. 公私关系的调整与粮价波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我国粮食产、供、销矛盾十分尖锐，市场粮价波动剧烈。在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国曾出现四次大的物价波动(1949年4月、7月、11月、1950年春节期间)，而且往往是粮价带头，牵动其他物价全面上涨，使整个市场不断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当时中央政府处理粮价波动的方式是以经济措施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到1950年3月，国家开始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为制止粮价波动采取了更加有力的措施，3月中旬以后各地市场粮价开始不断下降。至此，自抗日战争以来持续十几年的剧烈动荡的粮食市场开始趋于稳定。但是，在我国粮食状况逐步好转的情况下，全国粮食购销工作上却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国家粮食销售数量迅速增加，而在市场上收购粮食的数量虽然也有所增加，但却小于销售数量的增加，粮食购销差额不断扩大。这种情况及时引起了中央政府的注意①。

建国初期，我国商业领域甚至在土改完成之前，各级政府部门即在大部分地方建立了两种新的机构：一是国营贸易公司，二是供销合作社。准备通过它们逐渐使农村贸易社会主义化。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国营贸易公司和私人商号之间通行自由竞争。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国营公司开始获得重要商品官方垄断权的1953年11月②。粮食商业领域里的情况也基本符合以上描述。当时经营粮食的主体，除国营粮食公司和供销合作社外，还有私营粮商。与多种经营主体并存相适应，1953年底之前，粮食商业领域里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存在着两种市场 自由市场和以国营商业为代表、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计划市场，并由此决定了两种性质的价格——市价与牌价的并存。国家在粮食经营政策上主要掌握两个环节：一个是规定适当的公私经营比重 另一个是掌握合理的粮食价格水平，发挥国家牌价在市场上的主导作用。国营粮食商业采用经济手段为主，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组织粮食商品流通，逐步发展壮大，并取得了粮食市场的领导地位。私营粮食商业在全国财经统一、物价基本稳定之后就发生了困难。经过 1951 年底和 1952 年初的“三反”“五反”运动，私营粮商经营情绪低落，不少地方出现盲目排挤私商合法经营的现象。比如在河南省 1952 年前 9 个月的整个粮食市场销售中，国营销售占 80％以上，以致许多国营粮店脱销或被迫停售和限售。当年 9 月，在洛阳(灾区)、许昌(经济作物区)两专区出现农民卖掉棉花、牲畜抢购小麦的现象③。

1952 年 11 月 15 日，中共中央针对商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发布了《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决定对公私商业进行调整，要求保持当时私营商业的一般营业额不使其下降，以免店员过多的失业或使失业店员能够转业。调整的办法如下 首先解决价格问题，主要是扩大批零差价，规定日用品批零差价一般应扩大到 10％～18％(其中粮食类较原有幅度扩大约 3％④)；其次是划分公私间的经营范围 第三是取消各地对私商的各种不适当的限制，禁止各地交易所的独占垄断行为。关于公私粮食商业的经营比例，中央指示规定：“在农村中，合作社所要收购的，主要应是粮食，主要经济作物与若干种主要出口物资，至于其他的次要土产，应当让出来给私商经营。就是对于粮食及主要经济作物的收购，在目前时期也要克服包收思想。以当前的情况而言，单靠合作社，还是来不及的，因此，仍应维持现在政策，保留 20％～30％ 的粮食及主要经济作物，给私商经营”⑤。中央指示的意图可能如后来所说的那样：“粮食的阵地暂时还没有条件也不应该扩大，但也不应退让，应维持原有水平，保证 70％～80％ 的粮食由国家收购，这样才能充分保证市场供应”⑥。

在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的过程中，各地采取了扩大粮食批零差价，提高批发起点等措施。私商见到经营有利，开始活跃起来。1952年12月份，上海等地的粮食市场上私商经营额显著上升，有些一度停止经营的私营粮商又相继复业。但是在执行中央上述指示精神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问题：一是批零差价调整过大；二是有的地区盲目撤点，退让阵地。有的省大量撤销粮食收购网点，有的省把小城市粮食公司的零售经营全部取消，动员私商接办。许多地区国营经营比重下降，粮贩大量增加，有些农民也参加了粮食贩运，使国家粮食购销工作处于被动局面，从而助长了市场粮价上涨⑦。从1952年9月开始，抢购粮食的现象在河南、江苏、江西、山东等省相继出现，从而引起了粮价波动。这种局势到1953年上半年继续发展。不过，这次出现粮价波动的地域比较小。

1952年下半年～1953年初，河南省粮价波动的情况在当时是比较典型的。在1952年9月洛阳、许昌等地区出现抢购后，中南军政委员会于11月决定实行内地自由贸易政策，取消路条和购粮证以活跃初级市场。12月河南省政府决定调整物价和公私商业经营范围，省粮食公司撤销909个粮食购销点（占原有经营点的75.6%），允许私商经营20%～30%的粮食，同时将粮食批零差率改为9%。当月，抢购粮食之风由局部地区蔓延到河南全省。到1953年初财经和粮食部门采取了配售、限售办法，又不分对象，调低价格放手售粮。到1953年春节前，粮食供求紧张，私商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许多国营粮店脱销。南阳市各粮食供应点经常聚积上千人排队争购。当时，粮食市价高于牌价20%～40%，粮价出现大的波动。2月，河南省财委决定恢复和建立粮食购销网点，同时组织3 000万公斤粮食投放市场⑧。2月中旬粮价波动现象逐渐平息下来。中共中央在不久后总结河南这次粮价波动的教训时指出：根据河南1952年的粮食收成及存粮情况，如果处置得当，此次波动是完全可以避免的⑨。

由以上介绍可以看出，河南省1952年下半年到1953年2月的粮价波动，最初是由于国营粮食企业不适当的扩大粮食阵地，致使粮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